读史札记

乾隆《乐善堂全集》版本改订考

晏爱红

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皇帝降旨收缴改订自己居藩期间诗文作品的结集——《乐善堂全集》。为什么必欲修订少年之作呢？乾隆解释说：“今日偶阅《乐善堂集》，缘初刻所存卷帙颇繁，其中多有不甚惬心之句。”①

一

《乐善堂全集》是乾隆二年（1737）弘历即位后奉谕旨由武英殿雕梓发行的，它集中反映了涉世未深的年轻皇子弘历的政治理想、生活情趣以及闲适恬淡的心境，其中浸透着正统儒家的教条和理念。全书凡四十四卷，是刊行于世的《乐善堂全集》的第一个正式版本。

《乐善堂全集》的书名来源于乾隆当皇子时居住在大内时的书房——“乐善堂”。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1723 年 1 月）雍正即位，作为皇子的弘历随皇父迁居紫禁城内的西二所。乾隆即位后将西二所大加修缮，改名为重华宫。进入重华宫第一重宫殿名为崇敬殿，殿内正中间就是弘历读书写作之处——乐善堂，其父雍正皇帝御笔书写的“乐善堂”三字的匾就悬挂在迎面墙上。②

皇子弘历以“乐善”颜其堂，又以“乐善”名其集的原因，他在《乐善堂全集》中的《乐善堂记》和《乐善堂铭》中都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乐善堂者，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夫孝弟仁义乃所谓善也，人能孝以养亲，弟以敬长，仁以恤下，义以事上，乐而行之，时时无忌，则能因物付物，以事处事而完所性之本体矣。”③简单地说，“善”就是孝悌仁义，而“乐”则是以实践这些美德为乐。

早在雍正八年（1730）皇子弘历就已经开始预备遴选自己平日习作结集了。在《乐善堂全集·庚戌年原序》中弘历提到：“用是择取庚戌秋九月以前七年所作者十之三四，略次其先后，序、论、书、记、杂文、诗赋，分为十有四卷。”④庚戌年是雍正八年，弘历在这一年九月整理自己的习作旧稿，精心挑选出其中十分之三四，辑为《乐善堂文钞》（也称《庚戌文钞》）十四卷，为此，自己作了一篇序。除了自己作序外，弘历还先后请弟弟弘昼，表兄弟和同窗福彭，老师鄂尔泰、张廷玉、蒋廷锡、福敏、顾成天、朱轼、蔡世远、邵基和胡煦，以及三位叔叔——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果亲王允礼和允禧阅读并作序。乾隆二年正式刊行《乐善堂全集》时，乾隆又作了一篇《乐善堂全集序》，叙述了成书的原委，而把雍正八年自己写的序称为《庚戌年原序》，其他人原来为《乐善堂文钞》所作的序也都收录在《乐善堂全集》中。

下面将《乐善堂全集》现存版本分别说明：

（一）手抄本

雍正八年（1730）抄本，名《乐善堂文钞》，

[收稿日期] 2004-9-10
[作者简介] 晏爱红（1978—），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04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十四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室藏。该馆善本室还藏有张廷玉等人的《乐善堂文钞序》14册，雍正年戴临本，现储于黑漆描金箱内。

（二）初刻本

《乐善堂全集》（初刻本）的前身是雍正八年十四卷本的《乐善堂文钞》，到乾隆帝登基时，时光过了七八年，诗文又有了相当多的积累，大概“数倍”⑤于《乐善堂文钞》。于是，乾隆帝就利用“敕几余暇，取前后诸编，亲加删定，合为一集”⑥，命邵基、梁诗正、顾成天进行校对。故宫博物馆图书院藏“雍正年”残本，似为乾隆帝即位之初开始编辑的最早版本。尔后，大约用了一年时间，到乾隆元年十一月光景，四十卷本《乐善堂全集》编成付梓，第二年竣事颁行。

初刻本现存（1）雍正年残本，名《乐善堂全集》，原书四十卷，现存卷下6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室藏。（2）乾隆二年武英殿刻本，名《乐善堂全集》，四十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室、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善本室和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3）乾隆二年江苏省刻本，名《乐善堂全集》，四十卷，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此外，还有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室藏《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影印本，四十卷，海南出版社出版，1996—2000年。

（三）定本

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以《乐善堂全集》初刻本“体例未周，卷帙颇繁，其中多有不惬心之句”，亲加删定，令儒臣蒋溥重新编次，厘为定本三十卷，乾隆“复亲加裁定”，于当年刊行。⑦据主持校阅厘定工作的东阁大学士蒋溥说，定本“较之《全集》，存者十之五六云”⑧。

定本现存（1）乾隆二十三年内府精写袖珍本，名《乐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室藏。（2）乾隆二十三年武英殿刻本，名《乐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室藏。（3）《四库全书》本，名《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乾隆三十八年（1774）到乾隆四十七年（1783）修《四库全书》时，收入了乾隆帝所作的《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文集》和《御制诗集》。《乐善堂全集》是乾隆帝居藩之作，不属于御制的范畴，所以，严格地说《乐善堂全集》不是清高宗御制文集和诗集的组成部分，而是属于它的前编，故在编排上两者存在区别。《御制文集》和《御制诗集》中的诗和文是分开的，而《乐善堂全集》的诗和文则是放在一起的。（4）清光绪五年（1852）内府刻本，名《乐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光绪二年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奏定，谨照《高宗纯皇帝乐善堂诗文全集》原书“用集字版”“印一百部”，光绪五年书成。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资料室和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

此外，还有许多定本影印本，如（1）乾隆二十三年《乐善堂全集定本》影印本。载《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五年（1976）版。（2）《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光绪五年《乐善堂全集定本》影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综上所述，如果将《乐善堂文钞》这一手抄本除外的话，总的可以分为初刻本和定本两大系统。乾隆二年颁行的属初刻本，其余的均属定本系统。不过，定本系统中，光绪五年的版本虽然“一切格式均照原书”，但重印时奏准“遇有庙讳应避之字，缺笔敬避，至直书庙讳之处，用方格敬避”⑨，所以，与乾隆二十四年的定本个别字又有所不同。可以说，所有不同版本的改订本均源于乾隆二十四年由武英殿雕梓颁发的钦定刊本，在内容上、格式上都没再做本质的变动，所以实际上都属于同一版本——定本。

经比勘，以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的《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为蓝本，（此版本已与乾隆二十三年的《乐善堂全集》（初刻本）比较过，无任何差异之处）与乾隆二年雕梓颁行的《乐善堂全集》初刻本相比较，初刻本和定本在体例上存有很大的不同：

从卷数上看，初刻本四十卷，定本三十卷。从所收文体看，初刻本是按论、说、序、记、跋、书、杂著、表、颂、赞、箴、铭、制义、赋、古体诗、今体诗的体裁体例来组织安排的，定本是按论、说、序、记、跋、书、杂

著、表、颂、赞、箴、铭、赋、古体诗、今体诗来组织安排的。可见定本在体例上基本上没有作多大的改动，只是遵照乾隆帝“制义不必刊刻”的旨意删掉了制义[10]。另外除初刻本的卷之十一、十二制义两卷是全删外，其余的只是在篇幅上有所删减而最后压缩成的定本三十卷。具体来说，初刻本有 6 卷论，2 卷序、记，1 卷跋，1 卷杂著，1 卷表、颂，1 卷赞、箴、铭，2 卷制义，4 卷赋，11 卷古体诗，11 卷今体诗，共四十卷；《乐善堂全集》定本共删了 8 篇论，5 篇序，1 篇记，1 篇跋，2 篇书，3 篇杂著，1 篇颂，1 篇赞，18 篇制义，19 篇赋，87 首古体诗，136 首今体诗，总共删了 282 篇，内容大大少于初刻本。经删定，定本有 6 卷论，1 卷序，1 卷记，1 卷杂著，1 卷表、颂、赞、箴、铭，3 卷赋，9 卷古体诗，8 卷今体诗，共删掉了十卷，故全书减为三十卷。从篇幅上看，《乐善堂全集定本》大致相当于初刻本的十分之七。

总的看来，初刻本诚如乾隆所言“卷帙颇繁”，以致体例不周。如初刻本卷之八中既有序也有记，定本则把所有的序都归并在一卷中；初刻本的表、颂、赞、箴、铭共八篇文章就被分为两卷（卷之十一、十二），而定本全把它们归在一卷，这样安排则更为统一和严密，不零散。比较初刻本和定本体例上的安排，明显可以得知定本的体例更为完备和合理。就此而言，奉旨修订《乐善堂集》（初刻本）的户部尚书蒋溥等人说明皇帝删改的主要的原因在于“近复以全集卷帙颇繁，命臣等重为厘定编节”[11]是可信的；乾隆自己所说“今日偶阅《乐善堂集》，缘初刻所存卷帙颇繁，其中多有不甚惬心之句”也是可信的。

二

除了“卷帙颇繁”、体例未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令乾隆“不甚惬心”而必欲大动干戈收缴改订《乐善堂集》（初刻本）呢？下面将删除的内容分类加以阐述，以期挖掘出乾隆收缴改订《乐善堂集》（初刻本）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类是乾隆居藩时写给鄂尔泰、张廷玉、朱轼、蔡世远等师傅们的序文，分别予以删除。乾隆之所以删除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老师的序，除了以前乾隆当皇子时给他们写的序多溢美之词外，还有其他更深刻的政治原因。鄂、张深受雍正帝的器重，乾隆初政，任命鄂尔泰、张廷玉为总理事务大臣，并且公布了先帝《遗诏》，准鄂、张两人身后“配享太庙”。但鄂、张不和导致朝中隐然形成了鄂、张两派之争，使乾隆非常不满。因此删除这两位失宠的老师的序是很自然的。另外，《送毅庵鄂先生奉命经略西陲序》一文中将大学士鄂尔泰比作唐宪宗时平定淮蔡的丞相裴度，[12]而《送桐城张先生暂假归里序》一文中又说“吾师少保相国桐城张先生乃前相国谥文端之子也”[13]。“丞相”或“相国”这些词，这是已为热衷于实行“乾纲独断”的乾隆所忌讳，并极度反感，这两篇序文势在必删之列。至于删除写给朱轼、蔡世远这两位老师的序文呢，主要原因在于蔡、朱是乾隆当皇子时最尊敬的老师，因此在给他们的文集写序的时候，溢美之词不绝于笔，比如《二希堂文钞序》高度赞扬其师蔡世远对自己的教育培养，并把其老师比作左丘明、屈原、司马迁、贾谊等人。[14]《书答高安朱先生书》则把朱轼比作房玄龄、杜如晦、魏徵、韩锜、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一代名臣和贤相。[15]这些自然都构成了被删除的理由。

再就是删掉赞颂所谓祥瑞如《河清颂》之类的文章。雍正四年冬黄河水流澄清，群臣以为国家祥瑞，纷起称颂，雍正欣然接受，称天降祥瑞乃上天眷佑我列祖列宗，并为一大批官员加官进爵。年轻的皇子弘历为了博取父皇的欢心，也随波逐流作《河清颂》一篇，论证河清与政美的关系，认为黄河水清一事是天降祥瑞，嘉奖其父雍正治理国家得体，同时赞颂皇父“圣上盛德大业有而不居”。[16]在中国古代，清醒的帝王对灾异与祥瑞的态度虽然不能摆脱天命观的影响，但他们对待灾异大都遵循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借以自戒自警，而对待所谓祥瑞，他们一般能给以比较朴素的解释，而热衷搞祥瑞的帝王往往受到正统政治家和史学家的批判。一代圣主康熙就很少谈及祥瑞，但雍正与乃父大为不同，极其迷信祥瑞，

在他为帝的十三年中，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祥瑞”。而乾隆继位仅一个月的时间，即颁布了“禁陈奏祥瑞”的谕旨，谕称“海宇一道同风，众庶安居乐业，虽不闻瑞物之来，亦无损于太平之象，其或吏治民生，稍未协和底绩，即使休嘉叠告，诸物备臻，与地方治理，亦毫无裨益耳。”[17]完全改变了其父热衷祥瑞的做法，在位期间极少言及祥瑞，乾隆二十三年（1759）下令将他早年所作称颂雍正四年黄河水清的《河清颂》一文予以删除，足见乾隆对祥瑞等事物的看法与其父存在较大的差异。

再一类被删掉的文章涉及到“华夷之别”这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如早年所作《拟苏武答李陵书》一文，明显地是以汉族传统的民族观和中国观为价值取向来评价李陵、苏武等人的作为的。文中借苏武之口，指责李陵苟且偷生，以至“悖君臣之义，出父母之国，致使老母被戮，妻子鲸鲕，一门灭绝”。又借苏武之口慨叹：“呜呼！以武之微，奉使而归，主上犹赐钱二百万，位列典属国。苟足下（李陵）克奉朕功，或大节不夺，则主上之所以锡爵列土，裕及后昆者，更不可量，岂堂堂天汉而为负德之事哉?”[18]乾隆即位以后的二十几年，在执政过程中逐渐从对儒家的“华夷之别”的认同中解脱出来，全面接受皇父雍正对“华夷之别”批判性的解读，再回首看年轻时对李陵、苏武的评价，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将《高欢论》、《拟苏武答李陵书》全部删掉。

再一类是几篇论及“仁政”的文章全部删掉，如《管仲器小论》主要批评管仲辅助齐桓公只推行霸道，而不行王者之道，即只讲富国强兵之术而不讲明德新民教养之本，结果功止于霸，所以说管仲“器小”也。[19]《宽裕温柔足以有容论》则主要讲统治者应该以仁为治国之本，实行仁政。[20]《周过其历论》讲的是周行仁政，所以，周朝的历史超过原来预计的七百年，秦行苛政，“无仁心义闻，而徒以苛暴变诈，久不封建则国祚蹙。”[21]这三篇文章集中反映了青少年时期的弘历通过师傅的教导，同窗的切磋以及自己的消化理解，初步构建的以儒家价值取向为标准的政治理论体系。对已秘立为皇储的政治倾向，雍正当时即深感忧虑。据乾隆后来回忆说：“皇考尝以朕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22]。乾隆即位后，在施政实践中治国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初步由初年的一味宽缓趋向宽严相济，经过政策上、思想上的深刻变化，他开始反省青少年时所接受的过于理想化的某些儒家训条不切实际。乾隆二十三年，乾隆面对这些不成熟的少年之作怎能“惬于心”呢？最简捷的办法自然是全篇删除。

《乐善堂全集》初刻本中还有《隋文帝论》、《东方朔论》、《隋文帝论》、《读欧阳文忠公集》和《书李绛传后》等篇文章都被全文删除。《隋文帝论》批评隋文帝“宽厚不足而刻薄有余，不整大纲而急于小节，身代有司之事，不以诚信待人”[23]；《东方朔论》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兴利喜功，言利之臣列于天下，酷暴之吏满于天下”[24]；《读欧阳文忠公集》赞扬了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和政治上的功绩[25]；《书李绛传后》更断言中唐时期著名宰相李绛“之进退，关于国运”[26]。上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免偏颇绝对，其中所涉及的政治概念，如何谓“穷兵黩武“、“兴利喜功”、“急于小节”、“察察为明”，以及宰相的地位等等，从乾隆执政后日渐成熟的政治观念来看，都是应该重新认识并加以新的解释的。

三

清朝重视皇子教育，这在今天史学界已取得了共识。而皇子教育之成为制度，应该说是在雍正时期。雍正最看重的是对皇子的儒家文化的灌输，似乎忽略了培养他们本民族的精神和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尊重。在这一背景下，已被秘立为储君的皇四子弘历可以在读圣贤书、诗歌酬唱和纵情山水中度过了一生最为惬意的十三年时光。因此若单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个角度上讲，乾隆在即位之初可以说是一个儒生。

从《乐善堂全集》初刻本看，弘历与他的同窗们学习的多是儒家经史子集之类的东西，他们的老师几乎是清一色的儒学醇厚的学者或学者兼官僚。在弘历前后十三年的皇子时代，教过他的老师有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名义上的老师，这主要以大学士鄂尔泰

和张廷玉为代表，由于他们忙于政务，所以很少在上书房露面，即使偶尔到上书房也来去匆匆；另一类是实际任教的老师，这主要以福敏、蔡世远、朱轼为代表，这三人都是科甲出身、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儒学宿儒，也是对年轻皇子弘历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关于这三位老师，乾隆有一个总的评价，他在《怀旧诗·三先生》中写道："谓福敏：'吾得学之基'，谓蔡世远：'吾得学之用'，谓朱轼：'吾得学之体'。"[27]应该说这一总结是非常准确的。总之，乾隆在《乐善堂全集》初刻本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厚的儒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讲，是由福、蔡、朱三先生塑造出来的，其中福敏虽为满族人，但不同于康熙为皇太子处心积虑遴选的"不通汉文"的达哈塔，他是进士出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是汉化的满族士大夫。"三先生"不仅塑造了皇子弘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且对乾隆早期以宽缓为特征的施政方针有很深刻的影响。

乾隆初政，总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用宽缓代替皇父雍正的严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百姓实行仁政，二是对大臣官员宽容开明，三是缓和满汉民族关系。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执政之初的乾隆确实是以儒家的为政思想来治理国家的，但是在以后乾隆的政治实践中，这三方面都不断碰到新问题，不断遇到严峻的挑战。

对百姓实行仁政，但百姓似乎并不对其感恩戴德，反而藐视法令。如雍正时，查禁私盐很严格，小民往往触犯法网。乾隆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携带和贩运少量食盐，"贫穷老少男妇，挑负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禁捕"[28]。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有很多人，"以奉旨为名"，肩挑背负，贩运盐斤。镇江、广州等地"强壮奸徒，无不藉口贫民，公然贩私，成群结党，目无法纪"[29]。对此乾隆也不无感叹道："朕自临御以来，时时以我皇考爱养百姓之心为心。凡从前官吏之奉行不善，涉于烦苛者，皆次第革除，务期与民休息……即如私盐一事，朕本欲酌宽其禁，以养恤穷黎，而奸民乘机伺隙，结党呼群，凡向来之畏法而不敢轻犯着，今则公然肆横，无所惮慑。观此情形，是奸顽之民，不容朕行宽大之政也。"[30]以后随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乾隆更加认识到宽仁之政难以实行。对官员开明了则内外臣工又开始放纵，有的故态复萌，如谢济世又开始私自著书，而各省官员又因乾隆的宽大政策而变得越来越贪污腐化，致使亏空比雍正时期严重多了，特别是鼓励臣工建言，反而招致各种奇谈怪论非议朝政。针对君臣关系难以处理的情况，乾隆二年乾隆以《为君难，为臣不易》为题，于乾清宫亲试满汉各翰林。嗣后乾隆帝又阐发为君之难，在于"崇尚宽大，则启废弛之渐；稍事振作，则长苛刻之风。言路不开，则耳目壅蔽，将欲达聪明目，而无稽之言，勿询之谋，驰骛并进，不惟不足以集思广益，且足以淆乱是非"[31]。对贪官污吏及违犯军令的将官也加大了惩治的力度。越来越激化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不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儒家的仁政所能感化的，也不是宽仁的政策所能解决的，它有其自身的社会发展规律。另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越来越紧张的矛盾也不是实行开明的政策所能化解的，因为清朝统治者所实行的极端专制的政治体制和乾纲独断的手段不能为深受儒家政治理想浸染的汉族士人、士大夫所接受，而汉族的"圣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和"尊君礼臣"的理念也不能为崇尚极权的乾隆所接受，两种政治理念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总之，乾隆初政时期"以宽济严"的政策调整在严峻事实的挑战下，很快暴露出种种不足和缺陷，过去学到的谈起来头头是道的治国理论和方法在实际执政过程往往行不通，正如他自己在《古风》一诗中所述："囊余佩古训，治理颇能言。行之扞格多，乃悟实践难。"[32]他逐渐领悟出"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的道理，政策的调整开始以"宽严相济"的形式出现。[33]随着思想的成熟，他不能不反省年轻时学到的儒家思想体系存在的问题。

可以看出乾隆修改《乐善堂全集》初刻本是经过长期酝酿深思熟虑的，但是，乾隆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删订，其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从乾隆十六年（1751）的孙嘉淦伪稿案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及段昌诸私藏吴三桂反清檄文案的被揭露，促使乾隆

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严重性有了新的认识，对文字作品的政治影响力做了重新估量，在决定对汉族知识分子实行严厉的文化思想控制的同时，也开始清理自己年轻时写下的存在或多或少问题的习作。

从上面分析可以得知，随着乾隆的思想发生转变，早年所接受的儒家的为政思想和即位以后执政实践的冲突日益激化，删订《乐善堂全集》是必然的。但是，之所以会在乾隆二十三年决定删改，又有其直接原因的。由于一系列文字大案的强烈刺激，乾隆站在政治的高度认识到整饬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开始把目光转到征集、查阅天下所收藏的书籍上，并由此而开始重新审视、删改自己的青少年之作。乾隆决定删订《乐善堂全集》初刻本，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可以看作是其执政思想转变的一个信号，也可以看作是其政治上关注的热点转向的一个信号。

---

①《乐善堂全集定本》，卷首上谕。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②参见《清宫述闻》第771页—第772页，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③《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之八，《乐善堂记》，乾隆二年刻本。

④《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首，《庚戌年原序》，乾隆二年刻本。

⑤《乐善堂全集定本》，跋，乾隆元年仲冬月梁诗正恭跋。

⑥《乐善堂全集定本》，跋，乾隆元年仲冬月邵基恭跋。

⑦《乐善堂全集定本》，跋，乾隆二十四年岁次己卯上巳，东阁大学士蒋溥等恭跋。

⑧《乐善堂全集定本》，跋，乾隆二十四年岁次己卯上巳，东阁大学士蒋溥等恭跋。

⑨ 光绪五年《乐善堂全集定本》，弈　等奏折。

⑩《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卷首“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奉旨，制义不必刊刻，余依议，钦此。”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

⑪《乐善堂全集定本》，跋，乾隆二十四年岁次己卯上巳，东阁大学士蒋溥等恭跋。

⑫《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七，序，《送毅庵鄂先生奉命经略西陲序》。

⑬《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七，序，《送桐城张先生暂假归里序》。

⑭《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八，序，《二希堂文钞序》。

⑮《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九，序，《书答高安朱先生书》。

⑯《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十一，《河清颂》。

⑰《清高宗实录》卷二，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亥。

⑱《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十，《拟苏武答李陵书》。

⑲《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一，《管仲器小论》。

⑳《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一，《宽裕温柔足以有容论》。

㉑《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三，《周过其历论》。

㉒《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

㉓《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五，《隋文帝论》。

㉔《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五，《东方朔论》。

㉕《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十，《读欧阳文忠公集》。

㉖《乐善堂全集》初刻本，卷九，《书李绛传后》。

㉗《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八，《怀旧诗·三先生三首》。

㉘《清高宗实录》卷十一，乾隆元年正月乙卯。

㉙《清高宗实录》卷十八，乾隆元年五月戊戌。

㉚《清高宗实录》卷十八，乾隆元年五月丙申。

㉛《清高宗实录》卷四十二，乾隆二年五月辛丑。

㉜《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初集》卷八，《古风》。

㉝《清高宗实录》卷十三，乾隆元年二月癸酉。